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游记

谢彬 著

杨镰 张颐青 整理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游记

谢 彬 著

杨 镰 张颐青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游记/谢彬著;杨镰,张颐青整理.—2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6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ISBN 7-228-01057-4

I.新… II.①谢…②杨…③张… III.游记—新疆 IV.K928.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4001号

新疆游记

谢彬 著 杨镰 张颐青整理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199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 501—5 500

ISBN 7-228-01057-4/I·365 定价:16.00元

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

杨 镰 张颐青

《新疆游记》是谢彬写于“五四”之前——1916年至1917年——的一部西行记。它生动、详尽地记录了一次历时两年、几乎走遍新疆的探险旅行的全过程。

20世纪前一二十年间的新疆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新疆正处在民国第一任督军杨增新治下，闭塞、落后，但又是其近代史上最安定的时期之一。那时，中国西部不仅没有一寸铁路，而且新疆漫长多阻的交通线上尚未印下汽车的辙迹，所能指望的交通工具，和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并无二致。由于地处塞外，新思潮很难波及，乌鲁木齐能读到的内地报刊，最新也是四五个月以前的。乾嘉盛世遍及四裔的属国，到那时只剩有比邻新疆的那个小小的克什米尔土邦坎巨提（乾竺特），每年仍象征性地向“宗主国”——中国——进贡一两五钱沙金。清朝鼎革，外蒙“独立”，科布多终非我有，阿尔泰地区没有为科布多累及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而仍然孤悬西北隅，朝不保夕。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难解难分，俄国沙皇无力东顾，才有了喘息机会，使新疆保持了今天这样的版图……

那么，谢彬在实地经行之后，又是以怎样的立场和眼界反映他见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呢？他的见闻在他的情绪波澜中又做了怎样的升华？20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西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新疆游记》的价值何在？能给人们怎样的启迪和教益呢？

《新疆游记》的作者谢彬(1887—1948),号晓钟。湖南衡阳人。早年在本省读中学,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的酝酿阶段及其后的政局变革中,谢彬是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较多地接受了世界进步思潮。1912年原被本省选赴美国留学,但因政局动荡未能成行,而改赴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1916年归国,湖南督军署任职。旋即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以财政部委员身份,前往新疆及当时尚直属中央的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他从北京受命后返回湖南作了相应的安排,于10月16日自长沙首途,开始了历时14个月的旅行。次年12月16日,取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满洲中东路,回到北京,完成了使命。《新疆游记》就是此行的产物。

1919年,谢彬在上海主编《民心周报》、《醒狮周报》,积极投入“五四”运动。1922—1923年间,谢彬又受财政部委派前往另一个边远省份云南调查财政,并写出了《云南游记》。30年代初,谢彬出任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除两本游记,还著有《民国政党史》、《西藏交涉史》、《国防与外交》等书。在民国前期政界,谢彬始终关心边事边政,是比较活跃的人物,曾名列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1926年谢彬亲身参加了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八军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一度出任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9月病故于衡阳。谢彬的儿子移居美国,在80年代曾回祖籍观光。

谢彬的经历虽然丰富曲折,著述亦多,但其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撰写了《新疆游记》所致。

在往返新疆的一年多时间内,谢彬逐日写有日记(个别日期偶有短暂中断),不但记下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参照地方志及

前人著作,综述有关背景,勾勒所经之处地理历史的整体面貌。尽管旅途劳顿,条件极差,但他态度十分认真,常常秉烛达旦,下笔千言,酷暑严寒,兴未稍减。日记原名《新阿游记》,那是因为他经行时阿尔泰虽紧邻新疆,却是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正式集结出版时,阿尔泰已作为道区之一,改隶新疆省,故正名为《新疆游记》。

《新疆游记》全文首先陆续刊载于《时事新报》,并立即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关注,一时间《地学杂志》、《民心周报》、《上海晚报》、《湖南日报》等各地报刊纷纷转载。1923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并将其编入《新世纪丛书》。到1936年4月,13年间就曾重印九次,可见影响之大。

全书分为20章,共32万余字。除以新疆为主体,还涉及往返时所经各省(包括俄领中亚及西伯利亚)见闻。它基本上承袭了古西行记的结构,逐日记载见闻,但就其反映面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切而言,都是前此各种西行记所远不能及的。作为西域经行者之一,他依靠古老的交通工具:马车、骡车,马、骆驼,在新疆广袤、陌生的大地上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行程,并以他倾心撰写的《新疆游记》呼吁举国上下瞩目西部,敦促新疆政界面对世界潮流。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这部游记被视为关于新疆的百科全书。

二

1916年10月16日,谢彬乘江轮离开长沙。《新疆游记》称这一天为“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到汉口后,换乘京汉线火车,于19日到达北京。财政部委派随行的林烈夫已先期在北京相候。

11月11日,谢彬与林烈夫乘火车前往奉天(即今沈阳)。他们原计划经中东路,由俄国西伯利亚乘火车进疆。抵达哈尔滨,由于未能领到出国护照,只得返回北京。他们修改了计划,决定横贯中国内陆,从甘肃进入新疆。

12月6日,谢彬再次离开北京,“扶病乘京汉车南行”,踏上崎岖坎坷的西行征途。在当时海兰铁路最西的车站观音堂换乘轿车(马车),此后,再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可资利用。他路经西安、兰州,进入地旷人稀的河西走廊。到达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肃州(即今酒泉),已是1917年2月5日。

十几天后,谢彬路经了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踏上新疆大地。3月1日,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小住一周,受到第八代哈密王沙木胡苏特的款待。自哈密沿古老的军台旧驿西行,经鄯善、吐鲁番,于3月24日来到新疆省首府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在迪化停留了一个月,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财政、税收情况,对新疆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有了较多的实感,结识了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与新疆省长杨增新有了直接的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杨增新的信任。

当时虽已是民国,但新疆政治结构依然是左宗棠平定西域后所做的那个总体设计。左宗棠挥师西进,号称“湖湘子弟遍天山”,同作为湖南人,谢彬单车远征,颇有以后继者自视之意。

4月25日,谢彬与林烈夫动身赴天山南北各地调查财政。经昌吉、呼图壁、绥来(即今玛纳斯)一路西行,在乌苏四棵树地方,谒见了蒙古亲王帕勒塔的母后与福晋。5月10日抵达伊犁九城的首府惠远城(在今霍城县境),几天后便前往伊宁。5月17日,谢彬冒雨离开伊宁,取道那拉提(在今新源县境),横切入天山。

横越天山时,于巴音布鲁克晋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部落汗王布彦蒙库的福晋。布彦蒙库是渥巴锡汗的直系后裔,刚刚“被酒暴死”。越过的诺买提(今称“铁列买提”)达坂,谢彬一行进入南疆门户——库车县境。

6月8日由库车启程,顺古驿道前往喀什噶尔。经拜城、温宿、阿克苏、柯坪、巴楚、伽师,6月25日抵达疏附——即喀什回城。在喀什噶尔游览了著名古迹香妃墓,又前往英吉沙、莎车、叶

城、皮山，于7月18日到和阗（即今和田）。沿途一边调查财政情况，一边督促推行印花税。

7月22日自和阗沿古丝路前行，路经于阗（即今于田）、尼雅（即今民丰）、且末、若羌等古老的漠南绿洲，到达尉犁。这一路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行旅络绎不绝，商队相望于道，但谢彬路经时，已成为塔里木最荒凉沉寂的一隅。9月3日，谢彬进入繁荣富庶的焉耆镇，为环绕大漠的南疆之行打上了句号。然后经库米什——唐代的银山碛——越过天山，来到天山北麓的托克逊。9月14日，回到迪化。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走遍天山南北。云杉、雪峰、草滩，黄沙、白碛、绿洲，巴扎、驿站、市廛……一一为其写入了《新疆游记》。

在迪化休整时，他得知财政部已指派自己继续前往阿尔泰调查财政。一周之后，谢彬又启程西行，经阜康、孚远（即今吉木萨尔）、奇台，前往阿尔泰特别行政区域的首府承化寺（即今阿勒泰市）。离开“五路要冲”奇台，一路人烟稀少，主要靠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常常住在帐篷里过夜，除偶尔遇到蒙古族或哈萨克族牧民，几乎看不见村落、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0月19日抵达承化寺。

自抵达承化寺时刻起，一种危机感紧紧抓住了谢彬：阿尔泰孤悬西北，自外蒙古“独立”以来，东邻科布多已成为觊觎阿山的跳板；沙皇俄国的势力早已渗入到阿尔泰整个社会中，把它视为一块志在必得的新殖民地。阿尔泰当时虽然直属中央，但北洋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国极西北这块“不毛之地”当回事。由于中央拖欠“协饷”，阿尔泰的地方财政已到崩溃的边缘。

深秋的承化寺，雨雪交加，预示严冬将至。谢彬心情的水银柱，早已降至零度以下。自进入新疆以来日益增长的忧患意识沉积在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面对满天阴霾，谢彬为阿尔泰的前途苦思冥想，希望乘俄国陷于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尽量挽回丧

失的权益，“不然欧战一停，俄人元气恢复，势必卷土重来，侵我阿山以偿所丧。吾恐西陲益多事矣！”

然而他未能预见的是：写下这则议论半个多月以后，俄国便爆发了“十月革命”。

10月25日，谢彬离开承化寺，沿古道前往塔城。在塔城留住两周，11月18日由巴克图卡伦出境，进入刚刚推翻临时政府的俄国。俄国的亚洲部分也感受到“十月革命”的阵痛，社会动乱不安，矛盾重重。谢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搭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东返，自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于12月16日返回北京。

从首途以来，此行共用了427天时间，行程46111里。就一次探险而言，无论时间还是里程，谢彬都是前无古人的，至今也还后无来者！

在行程中，谢彬每到一地不但留心财政情况，还特别注意道里远近、民俗厚薄、土地丰瘠、气候好坏。经过困苦长途，到住宿地往往时过夜半；风餐露宿、人困马乏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除定时向北京财政部汇报调查情况，绝不因条件恶劣而稍有懈怠，还始终坚持把见闻及时载入日记。在新疆境内，他以近9个月的时间行程16675里，而《新疆游记》正是此行的忠实记录：它描绘了山川苍莽、林海无涯、物产奇异、沃野绵亘……它反映出当时所具有的闭塞落后、垦殖待兴、满营衰朽、外侨嚣张、王公腐败、官吏贪墨……

尽管行文简约，措辞讲究分寸，但谢彬的情绪、谢彬的思考、谢彬的志趣、谢彬的偏颇……无一不活跃在字里行间。

三

与前此的同类题材著述相比，《新疆游记》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信息量大，覆盖面宽，并有高屋建瓴的眼界和心胸。

在谢彬考察财政情况时，新疆共有40个县，3个县佐（准县），

共计 43 个县级单位,而他曾实地考察过其中的 38 个。他不但尽可能地占有前人的有关文献,还不惮劳苦,只要情况允许便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样,《新疆游记》的许多篇章就具有“独家新闻”的意义;《新疆游记》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是一般的经行者所能留意到的。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当年谢彬亲历的地方,今天早已面目全非。比如在赴和阗途中,他路经阿赫栏干、鸽子塘等地,并对这些地方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但如今谢彬所经的古驿路早已湮没于沙海,今天的喀什——和田公路已挪到古路以南十数公里处。当年谢彬路经或记载过的道里,有些根本就无路可循了。而许多他留宿过的绿洲也成为荒漠废墟,等待考古学家去“重新发现”了!我们想了解这些地方的原貌与变迁,就只有借助于《新疆游记》。

再如,今天从且末到尉犁,沿途满目凄凉,除了沙丘遍布,几乎见不到绿色,那个由塔里木河下游孕育的大漠东南的绿色走廊和水乡泽国已不复存在。在谢彬笔下,却是“沿途草湖弥望,胡桐亦多”,“庄田弥望,胡桐成林,芦苇丛生,地味肥沃”。这些写于 20 世纪初的真实纪录,当然非常可贵。

民国初年正是新疆相对稳定时期,谢彬见到的村墟、绿洲、古迹……有些毁于后来的战乱,也有些此后被人为的破坏弄得面目全非。吉木萨尔的千佛洞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新疆极少见的历时长远、香火不熄的佛教(包括喇嘛教)圣地,但经过 30 年代的战火与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两次人为破坏,现在早已难悉 30 年代前的旧貌。星星峡的盖孜玛札是伊斯兰教东渐的早期遗迹,40 年代以后被迁往哈密,它的原始状况人们知之甚少。这些情形在《新疆游记》中都有准确、具体的记述,可资参阅。

谢彬兴趣广泛、文化修养较高,同时也是品味精深的人,而且“性嗜游”,“地虽荒远苦寒,未以为苦”(9 月 16 日日记语)。所到之处,除了调查财政、督导印花,留意金融、货币、户籍、垦殖、物产、

贸易……还亲自去古遗址“寻宝”，细心询问问道（驿路之外的民间小道）里，认真了解地理沿革，注重收集传说及地名来历，关切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以上内容都逐日写入《新疆游记》，使其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

除上述特点之外，全书贯穿始终的对新疆一西部历史命运的忧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塔城等待出境时，谢彬为其新疆之行撰写了最后一章，并题为《开发新疆计划书》。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整部《新疆游记》就是一篇体大思精的《开发新疆计划书》。作者眼界宽，思想新，感受能力强。他从当时中国较进步、发达的南方来到地旷人稀、闭塞落后的西部，新鲜感唤醒了责任感，而强烈的反差使他的头脑更清醒，忧患意识更强烈，症结判断得更准确。

以有待开发的新疆面对野心勃勃的英、俄，谢彬在4月13日日记中指出：新疆“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国行省中，亦属鲜有。……今幸俄国多故，无余力来经营我，均势犹存；英亦难遽事鲸吞。苟延残喘，得保岁月。否则，久为波兰、帕米尔之续矣”。“故余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他还曾亲自向杨增新面陈便利交通之策（4月16日日记）。通过对于通讯延误、旅途坎坷的具体记述，谢彬把注意力始终凝聚在开发新疆的首要障碍——交通落后。与此同时，他一再指出整顿金融刻不容缓。这两点都是既有针对性又有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谢彬认为新疆的前景取决于对外开放。言及伊犁在开发新疆过程中的地位时，他着眼于向西开放，并大胆地预见伊宁“将与香港、上海诸埠并驾齐驱”（5月16日日记）。他进一步指出，对伊宁的关键位置万万忽略不得，因为“俄人知之最稔”，所以多年来一直“意在取我伊犁全部，归彼版图”。今天再来审度谢彬于八九十年前作的论断，的确发人深省。

与谢彬这一见解相关照的是，近年我有这样一个读史偶得：乾

隆皇帝在统一新疆后,事实上一直存有继续“西进”的战略思想。这就是他将几乎无险可守的伊犁作为新疆政区中心、将伊犁将军府设置于伊犁九城的潜在原因。因为继续西进,必然要有一个稳妥的起止点,而伊犁河谷正是向西发展最佳的位置!就此而言,今后的开发西部,伊犁当然必将起到上海、香港在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时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在游记中,谢彬时时处处表达出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这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开发新疆这样横贯古今的宏大主体意识来写新疆游记,在他之前,还不曾有过;在他之后,也不还未曾得见。

为此,他以屯田实边的传统边政思想为出发点,提出设县、分省两大动议:将新疆的县(包括准县)从43个增设为74个,这已经与今天的规模十分接近;将整个新疆分为山北、山南二省,以“西二省”与“东三省”并称。

为此,他提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远拒英、俄,近防日本,——针对日本插足新疆,他大声疾呼:“木屐儿之谋我,盖已深矣!”(9月16日日记)

读到这里,联系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阅读地震”。谢彬和许多同盟会前辈一样,他们大都在日本留过学或居留颇久。然而谢彬竟然在1917年的秋天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预言!果不其然,一二十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在中国舞刀弄枪、图谋一逞了!

当年新疆政界人士基本是内地来的汉族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谢彬所到之处,接触的主要是这批汉族官吏,受其影响自毋庸讳言。但是,谢彬根据自己的观察,一再为兄弟民族鸣不平。比如在7月18日日记中,特意指出:和阗居民“无狷薄靡曼之习,男务耕作,女稔箴解织纫”。而7月19日日记,在赞誉了和阗地毯精美之后,针对民族偏见说:“人

谓缠民愚陋，岂尽然耶！”在行文中，他一再指出维吾尔族群众能吃苦（如8月17日）。与此同时，他也反映了汉族群众在社会动乱时的灾难。如8月20日日记写了这样一件事：民国2年（1913），若羌哥老会“戕官案作”，省军来追击“会匪”，于是当地群众不辨青红皂白，乘机将若羌县所有汉族（共20余家）“尽击杀之”。

对待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野心，谢彬不遗余力地给予抨击、揭露。但在1917年4月4日获悉俄国革命政党已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即“二月革命”获得成功），便写道：“闻之欣然，为俄国革命党浮一大白！”并称赞此举为“一呼而竟数十年未竟之功。语云：精神一到，金石为开。洵不诬已”！

可见，他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对俄国人民与俄国革命，抱着友好诚挚的态度。

在我所闻有这样一种说法：谢彬进疆是来挑杨增新毛病的，但为杨增新拉拢收买，改变了初衷。细读《新疆游记》，我们认为这个传闻不一定有什么根据。4月16日日记记载了谢彬与杨增新的一次深谈。杨增新当场出示了致友人的函稿，并说明“某年来治新困苦与致谤原由”。谢彬洞悉内情后，这样评价杨增新：“杨之为人才识干练，能大有为。惟惜脑筋太旧，成见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为向上之发展耳。”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同时也是低调的。

不要中央政府财政补贴，而能维持新疆局面，杨增新是第一人。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谢彬是理财专家，当然能理解杨增新的苦衷。

另外，在11月10日日记中，谢彬批评了汉、回商人重利盘剥兄弟民族的百姓，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族关系未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展示了特有的危机感。

总之，以上种种内容都证明谢彬是以明智的眼光来评判新疆现状，以清醒的头脑来理解新疆的进步与发展。时至今日，《新疆

游记》仍然能使关注西部历史命运的人受到启迪,正在于它主旨是客观的,它的思想走向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然,作为八十多年前的旧著,《新疆游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记录了某些并无实据的民族风俗;第二,对有的问题并未透彻理解,便下断语。

谢彬本人不懂民族语言,所闻主要是得自当地汉族人。转述者的态度、取舍,往往能改变事情本身的性质,这已经是常识了。谢彬对其他民族的风情十分感兴趣,有闻必录,难免会记下某些不实之词。徐炳昶先生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就批评过《新疆游记》的某个段落。

新疆情况不同于内地,自古就具有其特点。不深切了解它的历史与现状,就不可能随时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谢彬在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断语,但也有个别议论显得比较草率。比如在《阳关道及缠回风俗》章,他既写下了确有独到见解的《南河北河辨》,又声称黄河重源说并非无据。在7月22日日记里,他既指出汉人“重利盘剥,为南疆恶习之一,固须痛除”。却又认为与其让外籍商民放债,不如“任汉人放债,尚为楚弓楚得也”。

此外,《新疆游记》中的某些记述与今天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有的可以肯定是属于讹传,如说锡伯族是吴三桂旧部的后裔等,那是因为当时曾有此一说,谢彬不过作了客观记录。这些错误当然不能归之于谢彬。

《新疆游记》虽然存在着某些问题,但它毕竟是同类著述中相当重要的一部。湖南人对近代新疆是有其特殊贡献的,左宗棠、刘锦棠率湘军平叛早已载入史册,广为人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两种湖南人撰写的关于新疆的著述也必将传之久远:一是益阳萧雄的《西疆杂述诗》,一是衡阳谢彬的《新疆游记》。

四

谢彬像他那个时代率先接受新思潮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也是旧学根基较深的人。从文体上讲，《新疆游记》与古人同类著述一脉相承。从行文可以体会出谢彬是长于发挥，善于收束，颇讲章法的文章家。

一般来说，谢彬下笔比较谨慎，褒贬不显于毫端，常常寓于具体描述之中。比如4月27日日记，他提到绥来县知事将一所学校改建为班超、张骞祠，并在祠中为自己立了长生牌位陪祀。对于这一令人哭笑不得的举动，谢彬仅评以：知事“自奉可谓不薄矣”！这七字以“春秋笔法”写尽了知事的丑陋与无知。又如6月15日日记写道：路遇三四十驾车辆，浩浩荡荡行驶在驿路上，一问，才知道是疏附县知事马绍武卸任回省。谢彬只缀以“阔哉知事！可谓满载而归矣”两句话，道出了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慨。

全书是以文言写成，古典散文大家的影响处处可见。5月9日日记写果子沟，5月13日日记写伊犁河，都是典范的写景佳什。仅举写伊犁河一段为例：

策马出南门，微偏西行。二十里，伊犁河沿。……花草杂放，弥望天涯；水鸟凫江，野兔穿林。哈萨毡房，纵横棋布；牛羊马群，牧放其间。复有渔夫数辈，结庐江浒，举网而渔，一网恒数百斤。牧谣渔歌，互相唱和，立马观听，大有潇洒出尘之想。旋买鲤鱼数尾，就烹哈萨毡房，以下携来之酒。高谈阔论，极其快活。觉昔人“恨不十年弃官，日饮沧州酒”洵非虚语。

不但遣词妥贴，音调铿锵，而且构筑出情景交融的整体氛围。他写了牧人渔夫，写了水鸟野兔，烘托出长途跋涉之后的放松感。

然而通篇未着一字，却又深深打动读者的，却是朦胧轻淡的乡愁。

在《新疆游记》中，大量的记录行程的文字。即使在这类地方，也能从单调、重复之中体现出日日常新的情愫，也能感受到未知世界的诱惑。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为《新疆游记》所作序言中说：

夫自民国创建以来，少年锐进之士，多汲汲于做大官，鲜留心于做大事者。乃谢君不过财政部一特派员，正俗语所谓“芝麻绿豆”之官耳。然于奉公万里，风尘仆仆之中，犹能从事于著述，成一数十万言之书，以引导国民远大之志，是亦一大事业也。如谢君者，诚古人所谓大丈夫哉！

孙中山对谢彬所作的肯定，对今人仍然有启示作用。

与民国初年相比，今天的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谢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却同样可贵。谢彬所倡导的关注西部的趋势，在今天的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新疆游记》序言中，孙中山先生又说：

今读谢君晓钟之《新疆游记》，行路四万六千余里，记载三十万言。述其足迹所经，观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

无疑，谢彬的《新疆游记》及孙中山先生对《新疆游记》及其作者所作的评价，今天仍然有其教益。

五

初读《新疆游记》时，我不过是个正在等待“而立之年”到来的青年。

自从读过《新疆游记》，我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一两年间都处在远离家乡亲人的不安定的旅途中，而这样长时间奔波于坎坷寂寞长途，不要说是靠马匹牲畜代步，即便利用最先进的越野汽车，旅行者就算不被拖垮，也免不了疲于奔命、敷衍塞责。可为什么谢彬却能总是那样兴致勃勃，那样敏锐关注，为什么还能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探索精神，还能有清醒的宏观意识，能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为新疆和中国西部拟设未来的蓝图？——当然，在《新疆游记》中，他一再说自己本性就是个喜欢游历、喜爱新鲜事务的人。但谁也明白，这并不足以回答我的疑难。

到现在，我步谢彬的后尘，也在新疆走完了“万里路”，也读过了古今中外有关中国西部的“万卷书”（这当然是个比喻），我才敢说，自己总算有了可以谈谈谢彬的“资本”。

应该说，从谢彬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后，就从未离开过，他陪伴我度过从“而立”到“知天命”的这二十个多思少眠的年头。在旅途迟滞时，在苦思冥想中；无论是与黄沙白碛相逢，或是徘徊于绿洲林莽……是谢彬给了我清醒的思维，是谢彬提起了我溃散的情绪，是谢彬让我为自己的短视感到羞愧，是谢彬告诉我怎样将西部的过去与西部的未来联系到一起！就我而言，只要一瞑目凝神就呼之欲出的，则是谢彬的使命感！使命感化解了古与今、西部与中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使命感赋予我们走向西部地平线的勇气！